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都市環境經理之實踐：一個都市社會運動取向之考察

Practice of Urb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 Investigation under Urban Social Movement Approach

doi:10.6154/JBP.1993.7.003

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7), 1993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7), 1993

作者/Author：曾梓峰(Tse-Fong Tseng)

頁數/Page：37-5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3/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54/JBP.1993.7.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都市環境經理之實踐： 一個都市社會運動取向之考察

曾梓峰*

Practice of Urb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 Investigation under Urban Social Movement Approach

by
Tse-Fong Tseng

摘 要

本文主要嘗試由歷史的觀點，將都市發展，放到近代資本主義廣闊的發展歷史中來探討。特別著重的是都市經理形成的過程以及最新的趨勢。作為都市經理最重要的課題，文中嘗試處理歷史發展中，兩股極為異質但又唇齒相依的動力。一種是來自特定階段資本主義的社會發展下，由經濟因素所帶動的社會形構構建的動力；另一股力量，則來自此種形構內生存的社會行動者。一種針對上述結構性社會開展動力，所導致的生存危機感的自我覺醒，而推動了社會運動的展開，且在其發展的歷程中逐漸取得足以抗衡的實力。這兩股力量相依相存的關係，使得無法偏廢任何一方。而其異質且相互矛盾的特質，卻又使得它的經理更為棘手。是否能夠妥善經理這兩種力量，就成了當前都市環境經理上的重大挑戰。

在理論的興趣上，作者則嘗試引用80年代以來，在學界展露頭角並廣泛被討論，且逐漸影響深遠之一種“非線性”的社會發展理論—「調節學派」的觀點，來勾勒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和開展的方式，再進一步在此脈絡下，探討都市發展和都市經理所遭遇到的課題。

ABSTRACT

This article sets out to provide from a historical viewpoint an analysis of the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apitalism. Its emphasis lies especially on the formation and the tendency of urban management. It deals with two different yet closely related motive for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Emerging in a specific stage of the capitalistic development, the one becomes a motive force of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that is brought about by economic factors. The other one comes from the society itself which exists in this structure. It functions in the above mentioned structural society and arouses the consciousness of existent crisis, thus it pushes forward social movements and gradually acquires two forces it is impossible to neglect either of them. Their different and contradictory matures make the management even more difficult. Therefore, to manage these two motive forces appropriately has become a great challenge in the present urb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e author tries theoretically to use a "non-linear"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the viewpoint of "school of regulation", which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and also has achieved profound influence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since 1980s, to give a brief account of the motive forces as well as the form of the capitalistic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to discuss the topics concerned with the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urban management.

民國82年2月28日收稿

* 德國Darmstadt大學建築學院博士候選人

Manuscript Received on February 28, 1993.

* Doktorand des Fachbereiches Architekturfür Technische Hochschule Darmstadt, Germany.

一、前言

由歷史的發展觀之，都市作為一個歷史的舞台，具體的呈顯了人類整體社會發展的情境。都市的發展，並非平順的，或依著某種特定的線性模式：它的空間結構，特別是“社會-空間”的形式，往往是被特定歷史邏輯下，政治社會中之權力關係、經濟結構下的衝突與妥協，以及社會抗爭下不斷變遷的各種條件，所共同創造起來的。都市經理，作為人類及其所處之間的一種斡旋的模式，代表的，不僅是對實質環境的經營，也是對這個環境中，人類社會關係之各種衝突與矛盾的調解。

此種斡旋的模式，在歷史進程中不斷的變遷著。而這些變遷的動力，則被這些模式所根植地、那個被危機和衝突所仲介地歷史脈絡，結構地決定著。對這些動力及其歷史脈絡的認識，因此成為了解都市環境經理以及其具體實踐，不可或缺的基礎。

本文嘗試透過特定的理論視野，以歐洲都市發展為對象，來探索和解析，不同時期都市環境經理模式和變遷背後，那個支撐它們的歷史脈絡，和於其中所建構起來的開展動力，以便動態地來呈顯都市經理的歷史實踐。不同於其它的理論視野，本文將社會中的行動主體(或稱為社會行動者 *soziale Akteure*)與其結構性生存環境之間互動的關連，也納入都市環境經理的歷史脈絡中來考量；視其為一股重要的變遷動力，並進一步來探討其所涵括的意義及開展向度(環境意識)，和其動力所凝聚的歷史形式(社會運動)。文末將以德國柏林市80年代 *Kreuzberg* 區都市更新為例，具體說明在新的社會變遷趨勢和社會開展動力下，新的都市經理取向如何反應新的挑戰。

二、都市經理之歷史發展——一個調節學派的觀點

對都市經理這個課題的認識，基本上，關乎了我們對社會發展動力，以及其開展的方式的了解：一個自19世紀以來，即逐漸侵入我們生活的底層，並根深蒂固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發展」。有關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研究，及其批評檢討，幾乎涵蓋了西方政治、經濟及社會學界思想的主要脈絡。本文不欲在此涉入其深邃廣遠的論述中，而直接引用80年代以來，在學界展露頭角並逐漸影響深遠之「調節學派」(*Regulationsschule*)的觀點，來勾勒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和開展的方式。再進一步在此脈絡下，探討都市發展及都市經理所遭遇到的課題。

調節學派產生的歷史時勢，乃在於西方學界一片批判質疑資本主義社會聲中，于70年末期，開始正視資本主義社會在其歷史發展中，能不斷克服危機而繼續存在的事實(註1)。它不僅渡過了30年代世紀性的蕭條和危機期，並在70年代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中，再度展現了它的生存能力。為了解釋此種特殊的生存能力，調節學派的學者們，嘗試對資本主義的研究，用新的問題範型來取代舊有的。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乃是一組特殊社會形構(*Gesellschaftsformation*)所構成地歷史的序列。而這組社會形構的特性，又被一組連結著的特定積累模式(*Akkumulationsregime*)，和政治制度的調節方式(*Regulationsweise*)所刻劃。他們嘗試將資本主義上一個階段的發展(世紀初到約70年代末)，在「福特主義形構」(*Fordistische Formation*)的名目下，進一步來描述它的特性。並且具體分析福特主義社會下，其特殊歷史積累模式和調節方式。其中最被強調的，是標準化的大量生產方式，與社會消費模式的特殊連結。它使得整個社會再生產的範疇，被資本主義化所貫穿。並且被透過一種大統合主義式的調節形式所操控和確保。福特主義社會因此可以被當作，在高度發展資本主義國家中，大量生產與大眾消費同步發展的一個歷史階段。同時也透過此種消費模型，給廣大的社會階層，帶來了生活的現代化，以及社會再生產範疇的資本主義化。

在理論層面上，調節理論不僅反對新古典主義一般平衡理論之抽象模型邏輯，也反對正統馬克斯理論對資本主義發展動力和危機動態的詮釋。特別是反對它們對歷史發展的解釋：歷史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邏輯下，經濟核心結構法則的開展。社會構造，因此被化約為一種上層與下層建築構造的模型。有別於此種看法，他們嘗試走出新的路線。基本上他們由法國社會學家阿圖塞(*Althusser*)的理論出發，將真實的社會發展，視為一被結構起來的整體——一個有許多結構的結構。每一個結構均有其相對自主性，並且彼此以泛層的方式相互決定。對調節學派而言，一個非常決定性，且已遠超越 *Althusser* 的看法在於：他們將 *Althusser* 理論中相當抽象的「結構」概念，透過「社會關係」(*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n*)概念來取代，而此種「社會關係」則是動態社會發展過程中各種「矛盾」(*Widersprüche*)的呈顯。在此種脈絡下，社會因此是一個為矛盾和衝突所中介、不斷產生危機、不斷改變、不斷需要再生產的歷史過程(註2)。在對西方社會歷史發展的研究中，他們視積累模式、調節方式以及霸權結構，為福特主義社會最重要的歷史機制。將真實社會發展複合體的特性——一個錯綜複雜糾結在一起的整體，作進一步的描述。以掌握那個彼此衝突，且帶著自身動力互相糾結在一起的政治的、經濟的以及意識形態的過程。並更進一步分析及解釋，那個為危機所

仲介、又同時被個別資本主義發展(經濟再生產)、國家的中介調節,以及社會關係的特殊形式,所共同決定之社會形構的發展序列。

調節學派的基本看法認為:資本主義的歷史,由世界尺度的角度來看,事實上是被一些特殊的社會形構所烙印。這些社會形構儘管有著同樣的基礎(私有財產制、工資勞動、被財貨交換機制所中介的生產與佔有等),但在不同的條件下(不同的生產交換形式、不同的社會化過程與社會關係、不同的國家特質及政治統治形式等)卻有著不同的區分。這些社會形構的發展,經常伴隨著一種深邃的週期性危機:它主要是由經濟發展中,獲利率長期的波動所造成。然而這種獲利率的波動,週期性危機的發生及其形式,並非簡單隨著某種客觀的邏輯。而是主要取決於,每個社會形構自己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結構的關係。此外其形成的過程,以及此社會形構的危機,尚取決於世界市場,以及被國家社會條件(即國家的結構性差異以及地區內時間差)所中介的資本競爭(註3)。

在此種脈絡下,每一個資本主義發展下的社會形構,事實上是由一種特殊的「積累模式」,以及其所相搭配的「調節方式」所鑄造。所謂積累模式,指涉了一種由特殊的生產和經理之技術,所支持的增值生產和利潤實現的形式。它涵蓋了各種生產和勞動的組織,以及,關乎勞動力和資本之整體經濟再生產的種類和方式。更具體的來說,它包涵了各種投資策略、資本創利策略、行業結構(特別是生產工具部門與消費財部門之關係)、工資關係、消費模式、社會關係、社會勞動的資本與非資本部門之關係,以及被整合到世界市場上的模式等等。而所謂調節,則是指一種經理方式。這種方式下,前述錯綜複雜生產與再生產脈絡下的各元素,被以一種社會的,更詳細的說,以一種社會角色行為規範的方式連繫起來。在這脈絡下,系統作為一個整體的功能,作為經濟機制的連結,是連繫著一組被給予,被經理過的社會關係、制度、形式以及結構。它涵蓋了一組由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及規範所建構起來的多重結構。以賦予整個系統再生產,所需要之某種程度的平衡及穩定。或建立各種制度形式、網絡以及明示性或暗示性的規範,以確保既定積累模式下,所需要及需被妥協的行為方式。每一個積累模式,都需要調節。然而都需要其個自不同,而具體的調節方式(註4)。

另一個調節學派的重要概念乃「霸權結構」(Hegemoniale Struktur)(註5)。透過這個概念,主要認為積累模式以及調節方式,並非為一種主動而機械性的結合。事實上,它們歷史而具體的連結,是在一種特定的宰制關係下被完成的。它在某種宰制關係下,賦予整個系統之經濟再生產(資本再生產中確保獲利的形式),以及政治

與意識形態再生產(合法性、制裁與共識),一種相對穩定的生存持續能力。因此每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構,都可以辨識出一種特殊的霸權結構——一種社會及權力結構的形式,以及其制度和規範的再生產。當然,這也不排除隨著某個形構危機的產生,會持續有一段沒有霸權的階段。在此階段,則不斷進行著一種對新的積累模式,以及調節方式的戰鬥。

在這裡,對資本主義社會形構(某種特定宰制關係下的積累,及調節脈絡)的週期性危機,有必要與積累及調節方式下的經濟景氣危機作一區分。這種社會形構,雖然在一種相對穩固、制度化以及有限彈性的霸權結構下,得以長期確保獲利率穩定。但危機的發生,則顯示了這種保證並非永久的。總的來說,形構危機的產生,主要是積累模式創利過程的動力,以及其所導致的社會經濟後果,衝撞了被制度和規範所固結了的調節方式,所能容許的邊界。資本積累所需要,及所帶來的社會面與技術面巨大效應,遲早會引爆這個衝突,並導致再生產的結構性干擾,而形成獲利率週期性的下降。一個價值法則實踐(在特定積累及調節涵構中被制度化下來)的歷史形式,反而形成了對資本創利的限制。

在上述的論述下,一個社會形構,及其危機,因此被當作一個複合體以及政治經濟社會的過程來理解。它的產生、內涵及程序,事實上並非同一發生,而是經常呈顯著一種不同時性。也就是說,政治經濟社會之危機過程,在時序上經常是某種程度相互獨立,而不同時登場。唯當它們結合在一起,且強度到達某種程度時,才會導致危機的出現。而此種導源於積累模式和調節方式,卻危及再生產的不相容性,則再度成為推動新的積累模式、新的調節方式以及新的霸權結構的契機。

上述調節學派的觀點,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即以積累模式、調節方式及霸權結構的概念,作為分析工具的選項。在寬廣的社會發展理論架構下,將都市及都市問題,作為一組歷史的特殊的生產與再生產、社會化(Vergesellschaftung, 或英文的 societalization; "society effect")、政治以及意識形態的脈絡來掌握。

(一) 19世紀資本主義發展下的都市化

自19世紀以來,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成了影響人類文明最鉅的事件。它所涉及的,不僅是技術和經濟的改變,還包括了深邃的社會形構之變遷。反映在人類實質環境上,便是都市化的產生。其具體的現象,乃進入19世紀以來,地理空間上快速的人口聚集以及都市成長(註6)。這反映了一種,由於工業革命所帶來生產技術、生產工具,以及生產過程變遷的影響和作用。具體的結果,乃傳統中世紀城市的衰頹,和現代都市的興起和擴

張(註7)。此種新的空間組織發生的基本邏輯：一方面是產業部門間，巨大的人口轉移(農業社會結構崩解、人口向城市集中以提供工業化所需要的勞動力)，另一方面乃產業結構變遷(由家庭經濟到手工業經濟再過渡到工廠經濟)，這同時也意味著勞動力集中、工場產生以及工業環境的建立(註8)。

20世紀前的都市化，基本上符合了那個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和開展的形態。這段時期的經濟成長，是立足於以工廠勞動形式為主的“粗放式積累”(extensive Akkumulation)上。它的積累策略，乃儘可能接近原料和廉價勞動力、低運輸費用、到銷售市場最短距離、及最低的勞動力再生產支出。此種競爭式的資本主義經濟邏輯，造成了一種無法測度的，空間和時間的經濟化。它所產生之新的機制(例如因為勞動力在空間上必須集中的工廠之誕生而造成居住與勞動分離，並形成整體家庭經濟的解體，工廠尋找最有利的區位、大眾運輸系統之開發以便利物資與人員的輸送等)，造成了都市急速擴張的主要動力。但也同時導致了空間與社會秩序的混亂。此種混亂與無秩序的主要原因，由今日的眼光來看，並非只是都市急速擴張下質與量的不調適。而是根植於，所謂前福特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財產的自由分配。財產的自由分配，在物競天擇式的競爭下，所產生的社會效應，乃社會財富不公平的分配。此種不公的具體表現，乃低工資和高房租，以及其所帶來的廣大都市貧民和貧民窟的事實(註9)。此種狀況的持續存在，一方面維持將福特主義時期資本積累的模式，限制在生產工具部門；另一方面，則不斷引發社會衝突，而導致19世紀末期激烈而影響深遠的勞工運動。

在此歷史脈絡下，19世紀中葉開始，出現一連串的住宅重整運動，都市衛生運動，以及都市計劃逐漸被當作一門學科建立起來。這事實上是針對都市混亂與衝突，所作的一種都市經理的嘗試。它實可被視為，解決特定積累模式下再生產困難，一種調節的機制來詮釋。

住宅重整運動，以及都市衛生運動，主要是針對工業革命後，都市化工業化過程，所帶來的社會、衛生和技術的問題而提出的。企圖以提供價廉而衛生的居住環境，給大量湧入都市的勞工大眾，來解決都市的混亂。雖然，由這些運動本身，及其程度有限的成績看來，它並未形成決定性的變革。但卻在社會輿論論述層面上，為勞動力再生產的問題，及大眾居住的方式等議題，開啟了討論的視野。在文化論述的層面上，也為居住形式與大眾生活方式的結合，開闢出討論的空間。並發展出所謂“工業社會下正確生活”的看法，以及與其相符的都市空間和建築有關概念(註10)。這些發展，都在20世紀有關都市經理的脈絡裡，展開了其支配性的影響力，而決定了我們都市生活的主要方式。

都市計劃的重要性之被體認到，而且逐步的被當作一門學科建立起來，是另一項重要調節機制的發展。作為一種工具，它的發展，乃企圖將都市混亂的現象，以及都市空間的擴張，按照某種秩序的觀念納入掌握。使用分區的觀念，便是在此種脈絡下被發展出來的。早期單純區分公共使用(街道)以及私人使用的方式被揚棄，而代之以混合使用拆解與隔離、都市整體設計、住所之社會區分、工廠遷往郊區等觀念，來決定都市被使用的方式，以及發展的規模及形態。都市衛生運動所揭櫫的觀念，如私人土地使用的限制，以及公共公園和休閒區的設置，也成了都市計劃分區規劃重要的依據(註11)。

(二) 20世紀初的現代化運動與都市計劃的興起

由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30年代之都市的發展，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而只是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更快速的發展和擴張。雖然有各種取向，改革性方案的嘗試，都市的混亂和社會的衝突，並未因之而排除。另一方面，作為推動都市演變動力的資本主義發展，則開始出現一些根本性的變化：以泰勒主義(Taylorismus)為基礎的新生產觀念，被引進了生產部門。它為劇烈的都市變遷，帶進了新的動力，並為社會衝突，投入了新的變數。泰勒主義的基本構想，乃在生產過程中，引入科學化合理化的概念，而建構起新的工作組織形態：將工作過程，以極度分工的形式作科學化的分解。將生產部件也作精密化與標準化的劃分(註12)，並引進機械化與自動化的傳輸設備。大生產線的生產形態於焉誕生。它大幅度的提高了生產力。此種生產組織產生了一些具體的社會效應：一方面此種形態的生產，需要高度集中的資本。配合高度的生產力，它產生了壟斷的機制。資本主義因此由自由競爭進入一種壟斷式的形態。生產線的工作方式，並無需專業技能，勞動階層因此大幅擴大。另外此種生產組織也造成大量工人的集中。它一方面擴大了剝削的層面，但也提供了工會組織成立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社會抗爭的資源。

都市發展，在此新的脈絡下，開始了一種相對有組織的集中與擴散。相對的在經濟發展的需求上，對資源使用，區位選擇等的競爭與衝突，也更為提高。此種新的競爭與衝突政治化的結果，乃國家介入的日益重要(註13)。於是都市計劃所具有的調節性功能，則進一步被倚重，而作為實際經理與調解此種紛爭，以及解決其所帶來的混亂之手段。原先仍只是一些理想概念或試驗方案，至今則變成重要的施工工具。此階段主要的作法，是直接由實質規劃或建設著手，以改善或控制都市的發展。在分區使用觀念的支配下，各種解決的方案即被提出。花園市、新鎮計劃、郊區化等這些著名的方案，表達了各種不同價值觀點、文化政治背景，以及歷史條件

下，嘗試解決都市問題的各種取向(註14)。

現代建築運動，以及其所鼓吹的現代化意識，在各種不同的取向中逐漸取得優勢。且在發展歷程中，成為一種支配性的霸權思想。其發軔始於此一時期，而影響力則遠達70、80年代。於世紀之初，當其它思想對新的社會開展動力，還在欲迎還拒的時候，一些現代運動的先驅，卻早已開始正視它所帶來的影響。泰勒式生產組織的巨大產能，雖然帶來了新的社會混亂，卻也提供了解決問題的新可能性。其所揭櫫的科學合理精神、功能導向的分工、標準化的大量生產，不但被轉化為一種美的精神與形式(機械美學、幾何美學)，更被認為是一種現代新生活形式的準則(註15)。它們對都市的看法，承襲了早期分區的觀念，更引進了功能的概念。都市功能區分為工作、居住、交通以及休閒，汽車以及高速公路連繫著不同的功能分區，居民居住在由公園環繞的標準化、大量興建的超高層公寓住宅中。柯比意(Le Corbusier) 1922年的300萬居民現代城市計劃，與1925年的巴黎計劃，所描繪的便是此種概念的典型。透過專業界的論述，這些概念，也具體的匯集在1933年國際現代建築會議的雅典憲章裡(註16)。並以一種典範的形式支配了二次大戰後人們對都市重建的想像。

(三)二次大戰後經濟發展下的都市經理

30年代全世界的經濟危機，並未造成資本主義的衰亡。然而卻宣告了粗放式資本積累模式時代的結束，以及精緻強化式積累模式(intensive Akkumulation)時代的來臨(註17)。早期自由競爭以及壟斷式的資本積累，其利潤之實現，對內取決於對生產勞動及其過程剩餘的榨取，對外取決於市場之銷售(消費)。然而泰勒式生產體系的逐步引入，卻造成了生產的決定性變革。生產力被大幅度的提高，但消費卻停滯不前。西方國家在進入20世紀後，其全球帝國主義式的經濟擴張，在民族國家興起後，逐漸遭到很大的困難，產品的國際市場不再順暢。30年代的經濟危機，乃此種歷史時勢的具體反應。美國羅斯福總統的新政策略，帶領美國渡過了此次危機。資本主義的內涵及其開展的方式，到此有了重大的轉變。從此一種以凱因斯經濟理論為基礎的社會福利國家模型被建立起來，同時在其歷史發展中成為一種支配性的社會形式。

它被建構起來的基本策略在於：為新的生產技術和體系，所帶來的大量生產，尋找消費人口。而最佳的解決方案，乃將原先廣大的勞動人口，轉變為消費人口(註18)(例如工人生產汽車，同時也變成汽車消費的對象)。此種由福特汽車工廠，所發展出來的新積累策略，不但帶來了輝煌的成果，甚至著名左派思想家Gramsci也受到感

動，而認為不失為一種解決人類社會衝突的有效方式(註19)(福特主義社會因之而命名)。然而此種轉變，在競爭與壟斷的資本主義體系內，事實上並不會自己發生。一方面消費能力的提昇，有待勞動者工資的提高，以及生活的改善，而這並不符合資方的利益。另一方面，廣泛的社會關係的衝突，其原因和目標，也在追求生活和工資的改善。此種“矛盾”政治化的結果，乃國家對再生產部門的介入。國家在其政治實踐中，構建、並且不斷提供複雜而廣泛的社會工程，和各種福利方案，來經理和調節，整體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間持恆的衝突。一種福特主義式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構，於是被建構起來。

福特主義式的社會形構之主要特徵，乃整體社會關係的國家化和資本主義化(註20)。國家化，反映了一種社會整體脈絡，被官僚體制化的情形。在一種所謂統合主義(Korporatismus)的機制下，社會上各種具政治影響力的因素，或團體(例如政黨、工會和教會等)，在某種價值體系的共識下，被納入體制內。它因而被標準化、規範化、被控制，以確保整體社會生產與再生產的持續進行。在社會的資本主義化下，傳統的社會生產與再生產關係，有了巨大的轉變。勞動者的工資和生活條件，因為福利政策的確保而有大幅度的改善。其效應乃市民社會中，經濟與社會逐漸的同質化與平等化。它所回饋的效果，不但在政治社會層面上，瓦解了傳統勞工社會運動的抗爭基礎；在經濟層面上，新的消費模式，擴大了內在市場，也確保了此種精緻強化式積累模式的持續存在。而標準化、規範化所帶來的大量生產，也大幅降低了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例如房屋標準化的大量生產降低了購屋或租屋的支出)。新的積累與調節脈絡，意味著存在一種新的資本主義社會開展動力(大量生產與大量消費)。它帶來了對傳統社會形構內部巨大的衝擊。傳統的社會階級關係、勞資關係、消費關係、家庭結構，甚至日常生活關係，以及生活方式，面對新的社會開展動力，都被迫必需去適應和調整。其所帶來的衝突和失序，則有待進一步的調整和規範。一連串精密而細膩的社會工程，於是逐步被建構，以便在社會實踐層面上，將此種新的積累與調節機制連繫起來。現代主義便在此脈絡下，逐漸發展成為一具支配性的霸權意識。它所揭櫫的原則與觀念，如進步與發展、大量化標準化、功能分化及規範化等等，則進入日常生活脈絡，成為支配社會行動者行為模式、思想、感受、以及價值取向，一種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註21)。

福特主義社會的形成，給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了體質上的變革。都市經理的任務及所涉及的領域，也有了根本上的改變。都市發展中的各種實質規劃與建設，被納入通盤的經濟發展計劃中，作為一種調節的機制，來

支持特定的經濟積累。由二次大戰後到70年代，歐美的都市經理，便是在此一脈絡下進行的。都市實質環境的惡化(註22)，則一方面反映了傳統功能式都市計劃的缺失(註23)，另一方面反映了在福特主義都市的發展動力下，投射在過程中各種積累模式，在時空上的失調與不一致(工業部門外移以及服務業部門的進駐)。

區域計劃的興起，不僅反應了對新積累模式施行空間分工上的支持(註24)，同時也是以經濟理性為導向，空間向度上的一種調節嘗試(註25)。50年代開始的都市更新，則更是一種以現代化為意識形態，積極性的調節作法，以迎接新的積累策略對都市空間的要求。面對都市內產業結構的變遷，都市空間的再結構與擴張，乃透過國家的中介，以技術理性和經濟主義為基礎的規劃概念來進行。同時以大片剷除後新建的方式，來改善惡劣的都市環境(註26)。

二次大戰後，歐美出現了大規模的市郊化過程。這一種被調節下產生的新人口移動模式，事實上，反應了一種福特主義社會下，新的消費模式。新的泰勒式生產方式，帶來了大量生產(房屋工業化、汽車大量製造)。生產力的提高，也帶動了工資的提高，價格相對低廉的產品(住宅、汽車)，得以在工資所得範圍內被消費。現代化意識，以及對現代生活的想像(住在標準化合理化功能化的自有住宅，以自用汽車往返於工作地點和居所)，成為促進這個過程的重要動力。政府也以各種配合性的公共設施，及基本建設開發計劃，和各種補助性措施來中介，以支持此種新積累策略下的消費模式(註27)。公共住宅計劃則呈顯了另一個社會階層(中低收入)的人口移動模式，以及和它們被經理和調節的歷史事實。早期的社會衝突和勞工運動對集體消費的訴求，使低收入住宅供給的新概念被提出來。透過合理化的大量生產、合理化與資本主義化的工業組織、以及相符合的消費行為，而推出標準化大量興建的公共住宅。它很快的變成各個不同利益團體共同希望之所寄。它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可以在新的積累模式，以及現代化意識形態的想像下被實現)，來調節社會的衝突(註28)。

(四)80年代以來都市發展之新課題

70年代中期開始，西方國家在經歷了二次大戰後長達二十年的長期繁榮後，再度遭逢了經濟衰退的危機。低成長率、低投資意願、無法擴大的國內需求、高漲的工資、高失業率以及低獲利率，成了每個國家最棘手的困難。泰勒式生產組織，所提供的巨大產能與獲利可能性，似乎消耗殆盡(註29)。產業技術的革新(特別是高科技產業)，帶來新的獲利潛能。然而其生產組織與形態，卻又與傳統產業環境起衝突(註30)。以各種社會福利方案等

調節策略，所建構起來的精密的規範化、制度化的福特主義社會構造，反而成為獲利的重大阻礙。在此種脈絡下，便又發展出一種以彈性策略為經、後泰勒主義生產策略為緯的新積累模式(註31)。其最顯著的歷史特徵，乃70年代開始以西方國家為中心，再次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以及經濟社會再結構的過程。其基本的作法，乃藉著空間再部署的策略，將產業部門與生產過程在地理空間上打散，造成既有經濟秩序之重組。現下新的國際分工即是此結果之具體呈現(註32)。

此種全球經濟再結構的過程，基本上包涵了幾種重要的傾向(註33)。

- 1.) 生產與勞動市場的彈性化。包含了產品、消費模式、勞動組織，以及勞動過程的彈性化。
- 2.) 生產與資本創利的國際化，及附帶而來的競爭模式。例如國際分工位置的競爭、關鍵性產業的競爭、金融指揮中心的競爭等等。
- 3.) 由於資本國際化，及快速流通所形成的獲利可能性，使得金融資本逐漸變成一項獨立的創利工具。並瓦解了傳統創利機制，必需與真實生產相連的限制。
- 4.) 一些過時的政治與制度的調節機制逐漸解除。例如退出福利政策、走向自由化等。
- 5.) 整體社會資本主義化的程度加深。不僅深及社會各部門，甚至及於政府部門及其任務。
- 6.) 就業結構，以及社會結構的日益極化。
- 7.) 消費模式的層級化，以及社會整體脈絡的片斷化。

新的彈性積累模式，伴隨的是新的調節方式的產生：除了彈性化與減少調節性的干預外，市場導向的控制更被強化。國家介入的形式，也有很大的改變。國家對許多任務部門，採取彈性的企業經理形式。而此種公共部門的資本主義化，則代表了社會福利國家形式的改組，以及對社會福利支出範圍的限制。一種新的“選擇性統合主義”(註34)也由此出現，最顯著的乃在高科技產業部門，國家與工業界緊密的結合。此外一種所謂“垂直分解式”的生產組織體系，也應運而生。它主要由一些專業的公司和企業，組成的彈性網絡所構成。此種生產與再生產關係的再結構，並不意味著資本控制的分散化，相反的資本國際化，更造就了資本集中的過程。這使得大的企業，在資本流動、生產關係以及銷售關係上，取得了跨國操控的能力。大資本因此更有能力，去除國家制度所實施的調節性介入。一些區域性或都市內的發展機會，甚至在企業的內部便可決定。

這些新的趨勢，給區域發展和都市發展，帶來了至今尚無法測度的影響(註35)。在可見的範圍內，全球性的區域整合，正如火如荼的進行著：一些新興的高科技都

會區，也以很快的速度起落；一種由於據有國際生產及資本創利的指揮中心之地位，而發展成的“全球都市”(global cities)，快速興起。在國家地方的層面上，新的區域不均產生於新舊產業的興頹之間。傳統工業城與工業區日漸衰頹，新興高科技都會以及金融都會則吸引了資金和資源，也造成了人口流動的新模式。由於這些變動所帶來的空間結構的重組，以及所伴隨著的社會形構的再結構，一種新的都市層級關係也在重新被組構著。而這些新課題，則給都市經理帶來了全新的挑戰。

三、環境意識興起的歷史脈絡

這裡所探討的環境意識是一種廣泛的指稱。指的是人對其所處環境自我意識的覺醒。其所含蓋的，不只是客觀條件下，環境品質好壞的判準，更包括了人在環境中自身的境遇感，以及人與環境、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本文將由這個層面出發，更進一步把環境意識放在一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脈絡中來分析。

社會運動在西方早有一段漫長的歷史。此處取60年代末期為分界，以社會運動作為一個指標，來歷史地說明環境意識興起的脈絡。在此之前的社會運動，尤其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勞工運動，在本質上，與60年代的社會運動有甚大的區別。早期社會運動所做的抗爭，可以說是為了社會的公平正義，或是一種對社會集體消費的訴求。而60年代以後的社會運動，則是一種對特定社會宰制的反抗。且其抗爭的過程，則可視為人類對其所處環境自我覺醒的過程。由於此種社會宰制的內容與形式，乃源自於人類所處的資本主義社會，所以前節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解析即是我們分析的起點。

(一)社會福利國家之建立--福特主義社會的形成

在前項1.3節中，已經略述了30年以來，特別是二次大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演變。新的積累模式被建立起來，具調節機制以支持此一積累模式的一連串社會福利政策也被建立起來，總此而以社會福利國家的形式出現。由於此一系統本身，並無維持其自身存在的基本條件，調節機制，便代表著國家直接介入了生產和再生產的部門，以各種有效的措施，促進經濟的循環，穩定社會的關係，支援社會和文化的再生產。它的發展意味著一種新的國家社會經理形式的誕生。

如前所述，福特主義的根本，乃建立在一種特殊的生產和消費的機制上。此種機制的擴大，乃整體社會的資本主義化。這種發展，產生了新的社會關係和新的衝突。市場的機制，是無法維持此種關係和排除衝突的。於是國家角色更為重要。而由於國家介入此類事務的控

制和經理，乃導致了社會國家化的結果。此外，福特主義積累模式之基本原則，乃在於建立了一種勞動力使用的積極形式。國家以各種社會福利政策介入，以確保勞動階層，不從福特主義生產與再生產的循環中脫落出來。各種由國家所組織與支持的基本建設，和集體消費(醫院、住宅、老人院、都市更新)，都成了此種模型決定性的支柱(註36)。

這些不同向度的發展所形成的社會形構，具有一明顯的結構性特徵：整體社會關係的官僚體制化。它所及的層面，不僅包含了一般的社會關係，更甚而包括了政黨和工會。原本作為社會抗爭及權力角逐要角的工會和政黨，在一種統合主義的機制下，被納入體制內被規範、被制度化(註37)。此種被官僚體制組織起來的社會，和它的國家化，事實上是被結合在一起而互補的。它們的結合同時也模糊了國家與社會的界線，並造就了一種社會及國家權力中心的複合網絡。它們以一種經濟理性為本的現代化霸權意識，透過技術官僚來經理社會中的各種事務。

(二)單向度社會--程式化的社會發展

福特主義社會危機的根源，產生在它本身的社會形構上。由於整個社會的發展，在物質條件上有了很大的改善，使得廣大的市民社會脫離了普羅階級(註38)。但其短期間內也造成了社會關係結構、生活的關連以及生活方式的巨大改變。

透過福利政策下充分的就業，造就了高比例的制度內受薪階級(公務員、職員以及工人)。受薪階級的結構，也在產業發展的過程中有很大的調整(以德國為例：工人階級由1882年的97%降到1977年的49%)(註39)。此種結構性的改變，造成了所謂新中產階級的出現，而改變了社會關係結構。此外新的就業機會、勞動關係、消費模式、技術變遷所帶來的影響，以及社會關係的商業化，也給整個人類的生活環境(形式與內容)，帶來了根本性的變革。

都市化過程，以及所伴隨的城鄉移民，摧毀了傳統的親屬、社區以及鄰里關係。早期勞工社區和住宅區，所形成的勞工文化和政治勢力，也在新的都市化(市郊化)過程中受到擠壓。作為傳統社會訊息傳遞網路的一些社會結社形式，受到新媒體(如電視等)的影響而破壞。國家官僚體制經理下，生活素質的改善，以及一統式的大眾消費模式，也形成了同質化及個人化的大眾社會(註40)。

家庭是這個社會變遷的核心：小家庭的建立、居住環境和居住關係得到具體的改善。勞動階級小家庭的建立，確保了他們在泰勒式勞動關係中的忠誠度(註41)。小家庭標準化及功能化的住宅形式，成了社會生存最根本的生物性據點。它與汽車共同成了福特主義社會消費模

型最重要的兩根支柱(註42)。小家庭同時也成為國家各種調節機制介入、以及霸權意識施展的對象。其具體的事實乃居住形式與居住行為的標準化及規範化。在「現代化正確生活」意識的牽引下，住宅成為居住的機器，作為純居住使用(生、老、病、死則不屬於居住的功能)。以經濟理性為原則的使用配置，把住宅作緊密、而合理化、功能化的功能劃分。公私也作嚴格的界定。住宅使用的面積大小、平面配置、技術配備以及衛生條件等，都在嚴格的規範下，由符合合理化標準化大量生產的建築生產所供應。為確保此種居住的形式，能在最小的衝突下維持長久，居住的行為也必需被經理和規範。此外，同樣的經理技術，也被施行和規範在與住宅有關的各種設施計劃和住宅區計劃裡(註43)。此一發展脈絡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其結果乃日常生活與行為舉止的同質化(規範化和公式化)。

福特主義社會的另一個特徵，乃個人化的趨勢。它是由傳統社會的剝落、新的生活方式、都市化、小家庭化、家庭與社會的移動、生活(存)救濟的官僚體制化，以及其它的社會調節所共同促成(註44)。此種個人化趨勢，被一種新的主體性所烙印。它的行為方式、思想與感覺模式，以及價值取向，又決定性的被消費模式的動力所支配。而這種趨勢也同時導致了一種社會孤立，以及社會分解的過程。

福特主義的社會發展，透過福利政策的中介，解決了傳統資本主義社會，某個層面衝突的根源(特別是生活中的物質層面)。然而其所建構起來，精密而程式化的社會，在現代主義的支配下，也成了Marcuse所批評的單向度社會。它所導致對人類生存意識上的拮制，開啟了社會衝突的另一個戰場，而於70年代在歐美社會掀起了新的社會運動。

(三) 危機與衝突--70年代末的社會反抗運動

福特主義社會形構內在的矛盾，製造了危機的可能性，它並非來自經濟週期性循環的危機，它有自己的原因和動力。而且是經常隨著經濟危機徵候的到來，而以特殊的方式被強調呈顯出來。

此種矛盾，其實是直接產生於其消費模式的動力上。由於福特主義積累與創利過程的決定性基礎，在於勞動力的再生產以及大眾消費模式上，為了持續的生存，因此它必需進行一永無止境的消費擴張，並且創造各種新的期望與需求。整個福特主義所建構起來，精密的程式化社會，即是在確保此一機制的順利進展。整個過程於是就形成如一個永無止境的螺旋(註45)。而危機產生的起點，便基植於處於此一情境的社會行動者。其最顯著的特徵，即是社會行動者價值模式與行為方式的矛

盾情結。

此種價值模式與行為方式的矛盾情結，當然是社會的產物。社會的分化(分子化)、個人化與規範化的衝突、傳統社會與文化脈絡的解體、家庭作為社會化樞紐後家庭意義的損失、勞動與休閒被外來因素所決定(勞動異化)、社會接觸的不斷被稀釋、各種官僚體制的調節措施、各種規範、監控，都直接間接的促成了此一情境的產生。它的具體發展乃如Habermas所描述的，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註46)。在這情境下，傳統的社會關連、規範性取向，與行為的模式都脫落了，而被外在特殊矛盾的社會條件所控制和決定。60年代中期，歐美社會運動舵手之一的Marcuse所鼓動的“文化革命”的可能性，即是針對此一情境所作的“生活慾望的革命”(註47)。

對應此種由外部決定(非自我意願)、高度依賴的情形，以及由於商品世界所造成的真實感的消失(商品世界創造形像和想像，而兩者往往不可區分)，人們的反應乃一種自我意識的產生。然而此種自我的意識，既不是擴張性的，也不是自憐式的，而是被強迫的，被包圍的。面對此一無法影響的外在世界，此種自我意識又往往伴隨著深刻的危機感。它的後果則又往往導致，社會行動者從此一外在世界自我退縮。其所關切的對象，也內縮到只落實在自我的身體、自己的健康，以及自己的生存上。採取自我的技術武裝，便成為對抗心理危機的唯一選擇。同時開始渴望得到自我的保護與安全感，此一欲求亦成了消費—富裕感的競爭者。一些概念的出現如“自我認同”、“個人性”、“自我實現”，都在反映此一困境，亦即人們在此一不可影響之外在環境下的掙扎與調適(註48)。

這項危機意識所形成的具體衝突，表現在二次大戰後開始逐漸出現，一些文化批評及社會抗爭運動上。首先登場的是一些文化性的批判，例如：美國式的生活的界限及社會成本？新消費與勞動關係，所建立的日常生活的正當性？(例如都市建設的功能主義取向、自用住宅聚落的擴張—破壞自然與綠地、被強迫的流動性、以汽車優先的都市、睡眠城市的社會孤立等)。同時也開始出現一些抗爭的行動，來反抗國家所中介對社會空間的介入行動計劃。(起先是由這些行動計劃的遭遇者開始，而後漸次擴展開來而及於其它社會團體)阻止高速公路新建、阻止都市更新計劃、對居住環境公共設施不足之反抗、佔屋運動等等。1966—1969年的大規模反權威運動(或稱為學生運動)，在某個層面上，可視為整個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變遷點。其歷史意義、內容和影響至今還未能定論，本文在此也不欲涉入其相關的論述內。然卻可將此視為社會行動者對其所處環境的一種覺醒後，所做的一種對制度體制，對霸權結構的反抗性作為。運動過

程中，所沉澱出來的一些正面的因素(解放、參與、自我意識、生活實踐)，便成了此一發展脈絡的傳統。而其所開展出來的動力，更成為影響社會發展的另一支力量，在90年代逐漸發揮足以抗衡的力量，以影響社會發展。

四、新都市社會運動之特徵與社會新趨勢

新都市社會運動，不論在政治或理論層面上的探討，都已經相當紛雜而歧異。本文的興趣，並不在深究其社會運動學理本身，而在其歷史實踐中，所開展出來的一些新的可能性與脈動。

(一)新都市社會運動之特徵

以下是社會運動歷史開展的過程中，所浮現出來的一些輪廓性特徵(註49)，可用以說明社會運動之特質。

1. 社會運動的發生，與福特主義社會各種向度的危機現象有關。並非是一時性的，而是整個系統脈絡的。它一方面反應的是危機的結果；另一方面則呈顯了支配性調節形式下，政治文化整合力的衰退。運動主角所推動的，並非是社會資源分配的問題，而在凸顯支配性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的結構性後果。新社會運動，因此可視為一種少見的、關乎危機感(危機經驗)的集體行動反應(集體反應方式)。
2. 新社會運動不只反應了危機，事實上也與福特主義所帶來的正面價值有關。教育、收入、社會國家的安全保障，大大的提高了政治參與時，個人的資源。傳統環境束縛解除的同時，也相對解除了文化的束縛，擴大了個人參與斡旋(行動)的可能性(替選性)。因此只有透過“危機經驗的結合”，以及“個人資源的擴大”，才有可能了解新社會運動。
3. 危機經驗的結合，以及行動能力的增加，並不會自動的導致集體的行動。它事實上是一種“自我生產”的過程。其中對整體脈絡的闡釋、組織形成、文化的實踐及象徵等等，逐漸被發展出來。它建立起集體的認同。此種認同並在各種次文化，或對立文化的網絡，以及組織形式的各種取向發展間被穩定下來。福特主義社會所導致的個人化推力，以及強迫的移動性，則在此種自我生產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4. 運動的建構，並非外在於政治與利益問題的。它使得一些被排除在外圍的利益、經驗、動機以及遭遇，能對抗支配性的政治文化。此種遭逢是複雜、衝突而多樣的。它必需建立，或開闢其合法性的領域。在一個既存政治形式中，其封閉性和開放性的界線，往往和

運動的強度，及其持續性呈一種辯証的關係。而一個運動的成功，也往往有賴於在體制內與各種利益團體、協會、政黨、甚至國家組織內的各個承辦負責機構的結合。在政治文化層面上的另一重要課題，則反應在“多數文化”(主流文化)對“少數文化”(弱勢文化)的斡旋，以及在找尋替選文化認同方向上的容忍與耐性。

5. 社會運動的發展，基本上也是個學習的過程。它有它的歷史，經驗過挫敗的改變，在各種選項上作過選擇，走過死胡同，受過媒體及公共輿論的支持與壓抑。在整體運動的再生產上，陷入過泥沼，或在政治上經歷過轉進的潛沉。既有的社會形構，以及政治制度的整體條件，並非不能接受新的替選或策略。然而卻有待社會運動建立起自己的公共輿論，以承擔此一集體的學習過程。

新社會運動可以60年代的反權威運動作為代表。然而它的落幕並不代表社會運動能量的萎縮，反而是社會整體反對運動環境的擴大。它主要表現在兩個發展的方向上，一個是內在於政黨與體制的「市民行動團體」的誕生，另一個則是「地方性運動環境」的形成。

(二)內在於政黨與體制的市民行動團體

受到60年代反抗運動的刺激，一種內在於政治黨派，市民行動團體(Buürgerinitiative)的文化開始形成(註50)。一開始大多是基於共同的遭遇，或是一些具體改變的願望，而產生了或多或少的持續性市民團體。不僅企圖透過傳統的影響方式，甚至要逐漸以一種示威的行動，來防禦自己的日常生活使之不被介入，或使自己生活的品質不被破壞。在它的歷史中，開始時尚只是一些具體要求、有限的參與慾望、以及非常少的極端形式。然而一種新的市民自我意識，遂由此而逐漸興起、擴大。70年代起，這些行動開始產生區域及跨區域的結合，不但彼此互相支援，而且共同推出替選的政治理念和方案(特別是一些環保運動、生態運動或和平運動等)。以德國為例，80年代時參加市民行動團體的人數已經超過參加政黨的人。然而由於這些行動團體，彼此異質性很高，故即便是面對同一課題(例如生態)也有非常不同的利益和意識形態取向。它們彼此的結合和作用，不但呈顯了各種不同的代表性差異、社會界線以及福特主義社會形構危機感的相互交流的結合，也促成了追求或修正社會模型的一股動力。

市民行動團體的涵蓋面非常的廣泛，由全國性的課題到地方性的課題，依團體的定位和性質而定。在德國，它的整體脈絡即孕育了綠黨的生存條件。

(三)地方化的反對運動環境

另一個重要的發展，乃地方化的反對運動之形成(註51)。剛開始集中在一些大學城，後來再擴張到一般地方去。它制度性的起源可回溯到一些碰面聚會溝通據點(小型俱樂部、青年中心、婦女中心)，所舉辦的各樣政治辯論、文化活動，或是政治活動。而後又擴展到書店、出版社、報社編輯部、以及各種不同的政治小團體等。最後再拓展到小酒館、畫廊以及咖啡廳等。

此種環境往往被新的文化模式、生活形式以及政治取向所印記。在功能上，它緩和了政治的張力，開闢新的題目，吸引政治新生代，提供一些次文化團體，及自治性訴求團體活動的空間。此種環境的形成，有助於各種極端或是替選政治取向的穩定化。它以它所有的活動空間、社會網路，提供一種自主性的可能，以對抗不穩定的政治氣候和壓制性的國家措施，甚至疏解個人對生存環境適應不良的壓力。

透過此種地方化的反對運動環境，可接收到新社會運動所傳遞出來的訊息。這並非是直接的政治行動，或是看得見的示威。而往往是一種沿著強調個人化，與異議權的新文化取向、新社會網路以及新認同的發展(註52)。其所引導的政治行動，也意在宣揚此種文化型式與價值。政治活動本身也正是在團體生活中，個人自我實現的實踐。

運動環境與社會運動之間，也是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只有在政治活動頻繁的地方，才能建立運動環境。替選的取向，也只能在政治衝突文化中被建構出來。而此種環境，也替市民行動團體的政治行動，孕育行動之內容及方向。這兩種力量，即構成社會發展的新動力，且足以與支配性的福特主義開展機制抗衡。

五、都市環境經理之新取向——一個柏林的例子

由前面的分析來看，當前都市的發展，至少有兩股極為異質但又唇齒相依的動力。這兩股動力的經理和調節，乃當前都市發展重要之課題與任務。一種是來自社會發展，由經濟因素所帶動的社會形構構建的動力。特別是80年代後，新的彈性積累模式，更推動著新的發展。另一股力量，則來自此種形構內生存的社會行動者。一種對生存危機感的自我覺醒，推動了社會運動的展開，在其發展的歷程中逐漸取得足以抗衡的實力。這兩股力量相依相存的關係，使得無法偏廢任何一方。而其異質且相互矛盾的特質，卻又使得它的經理更為棘手。是否能夠妥善經理這兩種力量，就成了當前都市環境經理上的重大挑戰。

面對此一情境，此刻並無法提出具體的解答。事實上，每一個社會的構造，均有其歷史文化與政治經濟社會之特殊性。解決的可能途徑，只有在歷史實踐的自身遭逢中才能展開。這裡僅以簡短的篇幅概略介紹一個著名的例子(註53)：1987年柏林國際建築展(Internationale Bauausstellung，下面簡稱IBA)。它並不是一個典範，但它是一個成功的案例。它所努力的方向，正反應了時代發展的趨勢，也代表了都市環境經理的新嘗試，值得作為一個參考。

柏林Kreuzberg為一歷史城區，以傳統的勞工住宅聞名。早在它的歷史發展中，逐漸成為社會弱勢以及異議團體聚集之所。各種形式的社會衝突和社會運動，往往都發源自此區，每年五月一日的勞動節，更會有傳統儀典性的街頭暴動發生。它的存在成了柏林政府之痛。在整體都市發展上，由於柏林具特殊的歷史地位和角色，因此其經濟發展形態也是特殊的。每年聯邦政府以高額的補助來維持柏林的運轉(為避免人口外流，居民均有極為優厚的補助)。此種經營的策略，以及其特殊的政治角色(美英法共管)，使得柏林成為國際活動焦點。它比德國任何一個城市都要國際化，而其受國際經濟活動影響的程度也更深。然而國際資金對柏林的投資在Kreuzberg區卻看到了反效果。由於資金的不願流入，使得此區和別的地區相較之下，無法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得到更新，同時更常阻礙整體經濟的發展。面對70年代以來，後福特主義時代下來自國際層面的競爭，柏林在爭取成為國際分工中樞紐位置的努力上不遺餘力，Kreuzberg的問題因此更顯得嚴重。另一方面，此區所孕育出來的反對運動氣候，也極力抗拒國家介入，抗拒政府以更新的方式來改善此區的都市環境。以下所要介紹的這個歷史性的更新計劃—Kreuzberg區的更新計劃(為慶祝柏林建城750週年而舉辦的柏林建築大展的主要部份)，便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被蘊育出來的。

一個面對這樣一種特殊涵構的更新計劃，基本上遭遇到幾個不同向度上的課題和挑戰。在社會的意義上，Kreuzberg作為一個都市中實質環境上衰敗的地區，並不意味著它是都市社會中的邊緣，也不代表是社會弱勢和貧窮的集結。存在於此區中各式各樣，履見不鮮的社會衝突事件(佔屋，示威等等)，說明存在著一種特殊社會力量的形式。事實上，這種脈絡形成的機制，乃特定的社會行動主體，它們在特定的歷史過程中逐漸成為社會權力關係中所謂的外圍(Aussenseite)。這蘊含了一種他們受到排擠的事實以及對社會主流勢力和體制的對立。透過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建構起來的集體認同意識(危機意識，且往往是被動而負面的)，他們在社會的衝突力場上凝聚成異質而多元，具有破壞傾向，反體制，對立和挑戰的力量。在實質環境上，這些力量則直接或間接的阻止了

此地區的發展和更新。在傳統上，以現代意識為霸權意識，以技術官僚為規劃主體，透過社會福利國家直接介入的經理手段，在自70年代以來激烈的社會抗爭經驗中，已經被宣告失敗和不可行。所表達的，不僅是這些力量對主流勢力透過此種計劃手段在政治社會和經濟層面上擴張的抗拒，也是在文化層面上對主流意識的一種拒絕。

對柏林Kreuzberg更新計劃而言，首要面對的，是此種對立的化解以及危機的克服。在整個計劃的精神上最大的不同，不在於以一種絕對支配的姿態，要求某一方對另一方的屈服或順從。整個規劃方向上的轉變，在於基於對社會現實及權力意識的正確認識和考量下，一種妥協的準備(kompromissbereit)。而妥協的基礎則在於對現存條件的尊重的接受。在IBA中這個機制表現在兩個面向上。題目的本身一重新恢復老城的居住價值一已經清楚的點出了這個線性。老城現存的實質環境，不再被當作惡魔(Teufel)和醜陋來對待，它不但在一個經理性的行動中，被當作有價值來接受，而且被當成新發展的基礎。那些由全世界被徵召來的知名建築師們，被要求在如此的基礎上作創造和表現，他們不僅要反應此種異質和多元，也要表現此種異質和多元。整個脈絡的發展，不僅是對現代主義的霸權意識強烈反省，在時序上也具體的呈顯了後現代主義的精神(它的意義不只是形式上的，更是社會的)。

另一個面向，表現在整個規劃理念之發展以及過程上。現存社會中那些異質而多元的因素，和它們所形成的衝突和對立被接受而納入體系，透過規劃方法的轉變，它們反而成為規劃發展的主要動力和承載者。以中央計劃式或大面積重整的規劃方式被揚棄，而代之以一種彈性化，去中央化的規劃方式，並發展出“小件”而“參與”的規劃流程。一種“內向式的組織”(以居住者為導向所成立的承建或發展公司)被建立起來。居民參與的優惠獎勵也被列入。保存式更新的技術性工作流程也被發展出來。一個城區委員會被成立起來承擔及協調有關的一切事務。規劃者、地方行政主管、地主、居民以及投資者被聚集在一起，討論並尋求關乎建築形式與都市建設各種可能的共識。透過獨立性機構所作的租屋者諮商，以及各種社會計劃的同時擬定，也都在國家補貼計劃下成為都市更新與現代化的標準程序。過去非法的佔屋團體，則在一種自力救濟計劃下獲得合法性的地位。透過內向式組織的協助，它們由都市更新，以及就業計劃下得到補助，並參與老舊建築區建築的更新。透過政府大力的補貼，地主保有它們的土地和建物以及更新發展的機會，而同時，原屬弱勢族群所擔心的房租上漲的壓力也被解除。

整個程序的進行，事實上並非平順且眾心所歸的。其中包括了高度的矛盾情結。然而它成功的達成了居住關係與環境改善的目的。另一方面，一個新的參與形式和參與組織被建立起來。它成功的將各種相互矛盾與衝突的潛在因素，整合到都市再結構的決定程序上來。居民對於其所居住的環境，被整合到新的創利機制與新的經濟條件的共識，也不再經由中央來規劃，而是由自己組織。

對政府言，集體性的共識是一個歷史性計劃成功的確保，而此種共識的形成，只能在廣闊的市民社會日常生活中被建立，建城750週年的名目為這樣一種意識形態的建構和整合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長達10年的準備期(1978-1987)，有充分的時間讓它在一個被給予條件的歷史過程中慢慢發酵和醞釀。以民間為主體的承辦方式，不但使得政府可以由合法性赤字(不得不承諾卻又作不到)的政治火線上(各種不同利益團體的攻擊)撤退下來，自由化的企業化經營方式，不但較有機會使得資源分配合理化，經營彈性化以及適應各種競爭下快速變遷的要求；民間社會豐沛的資源和力量，也因此得以充分的開發。在一個來自國際和國內競爭日益激烈的後福特主義時代，此種企業化經營的取向，不但有效的彌補了福利模型城市經營取向撤退後的空缺，更成為一種後福特主義時期都市經理的新典範。此外國際建築展的舉辦，不僅在實質上達到了都市更新的目的地，同時也吸引國際資金對此區的投資。而後者所帶動的附帶效益(旅遊、觀光、國際會議等)更符合了新的彈性積累模式的原則。

“謹慎而周到的都市更新”成為一種新霸權結構的榜樣。對都市危機和衝突的處理，因此有了更寬廣的空間以及更務實和涵容的視野。對反對立場的態度，已不再如以往的將之排除在外。當然並不意味著所有反對立場的要求都被滿足，也不是所有的遭逢者的利益都被照顧到。結構性的歧視仍然存在，但轉而為地方層次上各種不同團體的利益衝突，而它在這個層次上幾乎是無法排除的。然而衝突也因之被局部化、地方化。以柏林為例，似乎地方的關係在持續的危機中也可以被穩定下來。

六、結語

都市經理的實踐，其具體的歷史內容和作為，無法外在於其所根植的社會發展涵構外被理解和認識。本文主要嘗試由歷史的觀點，以歐洲都市的發展作為對象，柏林的Kreuzberg都市更新作為例子，將都市發展，放到近代資本主義廣闊的發展歷史中來探討。企圖由其社會發展的涵構中，掌握其中那些彼此錯縱糾結，真實的開

展動力和開展形式，以及相對應都市經理實踐的具體歷史內涵。其中特別著重的是都市經理形成的過程以及最新的趨勢。作為都市經理最重要的課題，文中嘗試處理歷史發展中，兩股極為異質但又唇齒相依的動力。一種是來自特定階段資本主義的社會發展下，由經濟因素所帶動的社會形構構建的動力；另一股力量，則來自此種形構內生存的社會行動者。一種針對上述結構性社會開展動力，所導致的生存危機感的自我覺醒，而推動了社會運動的展開，且在其發展的歷程中逐漸取得足以抗衡的實力。這兩股力量相依相存的關係，使得無法偏廢任何一方。而其異質且相互矛盾的特質，卻又使得它的經理更為棘手。是否能夠妥善經理這兩種力量，就成了當前都市環境經理上的重大挑戰。

柏林的例子描述了一個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經驗。然而它並不是一個典範，也不能為其它特定都市發展下的危機和衝突提供解決問題的答案。一如前所述，每一個社會的構造，均有其歷史文化與政治經濟社會之特殊性。解決的可能途徑，只有在歷史實踐的自身遭逢中才能展開。這點當我們對問題的審視點回到台灣的時空上時，顯得特別重要。在國內專業論述領域仍常習於直接由國外引進典範和經驗的當兒，這點應是反省的起點。歐洲的經驗不同於台灣，柏林的例子更無法用於台灣。45年的經濟發展給台灣帶來了特殊的積累模式，45年的政治發展也塑造了台灣特殊的政治調節脈絡以及霸權結構。它們共同締建了台灣特有的社會開展動力以及特殊的社會形構。台灣的都市問題及其危機，與都市經理的詭弔和脫落，再再都反應了這些特殊性。

台灣特殊的社會脈絡，事實上已經蘊含了經理這些問題的途徑和力量。它們可能已經存在，端賴我們是否能正確認識到它們存在的形式和潛能。80年代以來全世界經濟再結構過程中，台灣在國際分工中角色的劇烈變動，至少已經衝擊和鬆動了原有的積累模式，更進而改變了原有政治生態下的權力關係。此種重組與再結構事實上也提供了都市再經理的空間和基礎。80年代在台灣登場的社會運動則是另一種可能性，它呈顯了一種來自民間社會底層所蓄積的能量，在新的社會形構下的翻動。然而它的被認識，似乎仍受到極大的侷限。其所迸發出來的一些火花，似乎帶來了一些希望，令人感到鼓舞；卻又不易掌握且缺乏共同整合的基礎。當各種路線在口號上呼喊，宣稱自己是公理正義的化身時，卻忘記正義公理往往只是一種對權力關係的想像。當一些有意義的運動力量逐漸道德化時，卻不知自己已和自已所生根的泥土漸行漸遠。當一些運動的行動者感到自己的挫敗和力拙時，很可能還沒認識到自己在正在一個應該打陣地戰(Stellungskrieg)的地方衝鋒陷陣的打著運動戰(Bewegungskrieg)(Gramsci的概念)。

上述這些新興力量和其變動的可能性都與都市經理的課題息息相關，因此如何在我們的歷史脈絡中認識與了解它們，成了我們極為重要的任務與課題，如此我們才有可能在自己社會的特殊性和歷史現實上發展出我們自己的都市實踐。

註釋：

- 註1. 有關此方面先趣性的開拓工作，最早始於法國的經濟學家Aglietta，參見 Aglietta, 1979，後續的研究及重要著作參見 Jessop, 1988: 380-390; Lipietz, 1982: 33-47, 1985: 109-137, 1986: 16-40, 1991: 677-694; Huebner, 1990; Hurtienne, 1986: 60-110; Hirsch/Roth, 1986; Hirsch, 1990; Mahnkopf, 1988; Demirovic/Krebs/Sablowski, 1992.
- 註2. Lipietz, 1992: 9-54.
- 註3. 由世界市場的層面而言，各國家內社會結構條件的差異，區域內發展的時間差，往往成為資本競爭下決定性的獲利機制，然而由於此種利潤實現的方式，經常取決於結構性的外在條件，因此社會的危機往往產於世界性的資本積累及競爭過程中，國家所處的結構性位置。
- 註4. Lipietz, 1985: 121.
- 註5. 法國調節學派的學者首先提出了"積累模式"和"調節方式"兩個概念。為了改善此理論傳統的偏差，特別是對真實社會發展中以國家為舞台所建立起來"歷史性權力集團"的忽視，一些德國社會學者嘗試再附上了"霸權結構"的概念，企圖透過這個導源於Gramsci與Poulanzas的概念，將調節理論與國家理論結合起來。參考Hirsch/Roth, 1986; Hirsch, 1990; 以及 Jessop, 1988，最新的討論則見 Demirovic/Krebs/Sablowski, 1992.
- 註6. Thienel, 1973.
- 註7. Frampton, 1987: 19-25.
- 註8. Castells, 1977: 14.
- 註9. Rodenstein, 1991: 36.
- 註10. Schmoll, 1990: 298.
- 註11. Benevolo, 1971; Rodenstein, 1991; Rodrigues-Lores/Fehl, 1985; Schmoll, 1990.
- 註12. Hirsch/Roth, 1986: 50.
- 註13. Schmoll, 1990: 291.
- 註14. Rodenstein, 1991: 35-52.
- 註15. Le Corbusier, 1929, 1964.
- 註16. Hilpert, 1984.
- 註17. Aglietta, 1979.

- 註18. Wallerstein, 1979; Lutz, 1984.
- 註19. Gramsci, 1967: 376-404.
- 註20. Hirsch/Roth, 1986: 48-74.
- 註21. Hirsch/Roth, 1986: 75.
- 註22. Bahrtdt, 1969; Jacobs, 1963; Mitcherlich, 1969.
- 註23. Keller, 1977: 200.
- 註24. Misera/Honjo, 1981.
- 註25. Scott, 1984: 141-156.
- 註26. Keller, 1977; Fainstein, u.a., 1983.
- 註27. Aglietta, 1979: 159.
- 註28. Kraetke, 1990.
- 註29. Lipietz, 1985.
- 註30. Lipietz, 1985; Piore/Sabel, 1985.
- 註31. Piore/Sabel, 1985; Storper/Scott, 1986.
- 註32. Froebel, F. u.a., 1979, 1986; Walton, 1985.
- 註33. Kraetke, 1990.
- 註34. Haeusler/Hirsch, 1987: 651-671.
- 註35. 一些較為具體的分析參見 Borst, R. u.a., 1990; Feagin/Smith, 1987.
- 註36. Lehnhard/Offe, 1977: 98-127; Lutz, 1984; Piore/Sabel, 1985.
- 註37. Hirsch/Roth, 1986.
- 註38. Giddens, 1984: 188.
- 註39. Mooser, 1983: 148.
- 註40. Hirsch/Roth, 1986: 56; Mooser, 1983: 175.
- 註41. Elias, 1978: 260, 甚至Gramsci也給高度正面評價, Gramsci, 1976.
- 註42. Aglietta, 1979.
- 註43. Schmoll, 1990.
- 註44. Beck, 1983: 35-74.
- 註45. Lutz, 1984.
- 註46. Habermas, 1981.
- 註47. Marcuse, 1981.
- 註48. Lasch, 1984.
- 註49. Hirsch/Roth, 1986: 194-196.
- 註50. Roth, 1985: 44-49.
- 註51. Hirsch/Roth, 1986: 222.
- 註52. Gundelach, 1984: 1049-1081; Nédelmann, 1984: 1029-1048; Nelles, 1984: 425-440.
- 註53. Kraetke/Hirsch-Borst/Schmoll, 1984; Schmoll, 1990.

參考文獻：

- Aglietta, M.
1979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 Experience, London.
- Bahrtdt, H.P.
1969 Die moderne Grossstadt, Hamburg.
- Beck, U.
1983 "Jenseits von Stand der Klasse?", in: Soziale Welt Sonderband 2, pp: 35-74.
- Benevolo, L.
1971 Die sozialen Urspruenge modernen Staedtebaus, Gutersloh.
- Borst, R; S. Kraetke; M. Mayer; R. Roth; F. Schmoll (Eds.)
1990 Das neue Gesicht der Staedte, Basel.
- Brand, W.
1982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Entstehung, Funktion und Perspektive neuer Protest potentiale, Opladen.
- Castells, M.
1977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 Demirovic, A.; H. P. Krebs; T. Sablovski (Eds.)
1992 Hegemonie und Staat, Muenster.
- Elias N,
1979 Ue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zation, Frankfurt/M.
- Fainstein, S.S.& N.J.; R.C. Hill; D.R. Judd; M.P. Smith
1983 Restrukturing the Cit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Redevelopment, New York.
- Frampton, K.
1987 Moderne Architektur: Eine kritische Baugeschichte, Stuttgart.
- Froebel, F.
1979 Die neue internationale Arbeitsteilung, Reinbek.
1986 Umbruch in der Weltwirtschaft, Reinbek.
- Giddens, A.
1984 Die Klassenstrukturen vorgeschrittener Gesellschaften, Frankfurt/M.
- Gramsci, A.
1967 Philosophie der Praxis, Frankfurt/M.
- Gundelach, P.
1984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New Form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 in: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6): 1049- 1081.
- Habermas, J.
1981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Frankfurt/M.
- Haeusler, J.; J. Hirsch
1987 "Regulation und Patein im Uebergang zum

- Postfordismus", in: Das Argument (165): 651-671.
- Hilpert, T.
1984 Le Corbusiers "Charta von Athen" Texte und Dokumente, Branschweig.
- Hirsch, J.; R. Roth
1986 Das neue Gesicht des Kapitalismus, Hamburg.
- Hirsch, J.
1990 Kapitalismus ohne alternative?, Hamburg.
- Huebner, K.
1990 Theorie der Regulation: Eine kritische Rekonstruktion eines neuen Ansatzes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erlin.
- Hurtienne, T.
1986 "Fordismus, Entwicklungstheorie und Dritten Welt", in: Periphrie, (22/23): 60-110.
- Jacobs, J.
1963 "Tod und Leben grosser amerikanischen Staedte", Berlin.
- Jessop, B.
1988 "Postfordismus: Zur Rezeption der Regulationstheorie von Hirsch", in: DasArgument (169): 380-390.
- Keller, G.
1977 Raumordnungspolitik und Altstadtsanierung, Frankfurt/M.
- Kraetke, S.
1990 "Fordistischer Wohnungsbau in Deutschland: "Soziale Bauwirtschaft" der 20er Jahre als Vorreiter", in: Borst, R. u.a.(Eds.) Das neue Gesicht der Staedte, Basel.
- Kraetke, S.; R. Hirsch-Borst; F. Schmoll
1984 Zwischen Selbsthilfe und Staatsbuerokratie. Neue Wege fuer kommunale Wohnungspolitik, Hamburg.
- Lasch, C.
1984 The Minimal Self. Psychic Survival in Troubled Times, New York/London.
- Le Corbusier
1929 Der Staedtebau, Berlin.
1964 Festlegungen zu Architektur und Staedtebau, Berlin.
- Lenhard, G.; C. Offe
1977 "Staatstheorie und Sozialpolitik", in; v. Ferber, C.; F.X. Kaufmann (Eds.) Soziologie und Sozialpolitik, pp.: 98- 127, Opladen.
- Lipietz, A.
1982 "Toward a Global Fordismus?", in: New Left Review, (3/4): 33-47.
1985 "Akkumulation, Krise und Ausweg aus der Krise: einige Methodische Ueberlegungen zum Begriff der "Regulation"", in: Prokla, (58): 109-137.
1986 "New Tendenc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ision of Labor: Regimes of Accumulation and Modes of Régulation", in: Scott, A.J.; Storper, M. (Ed.), Production Work Territory, Winchester, Mass. pp.: 16-40.
1991 "Demokratie nach dem Fordismus", in: Das Argument, (189): 677-694.
1992 "Vom Althusserismus zur Theorie der Regulation", in: Demirovic, A.; H.P. Krebs; T. Sablovski, (Eds.) Hegemonie und Staat, Muenster, 1992, pp.: 9-54.
- Mahnkopf, B., (Ed.)
1988 Der gewendete Kapitalismus - Kritische Beitrage zur Theorie der Regulation, Muenster.
- Lutz, B.
1984 Der kurze Traum immerwaehrender Prosperitaet. Eine Neuinterpretation der Industriell-kapitalistischen Entwicklung im Europa des 20. Jahrhunderts, Frankfurt/M.-New York.
- Marcuse, H.
1981 Die Revolte der Lebenstrieb, in: Redaktion Psychologie Heute, (Ed.), Weinheim/Basel
- Misera, R.P.; M. Honjo (Eds.)
1981 The Changing Perception of Development Problems, Hong Kong
- Mitcherlich, A.
1969 Die Unwirtlichkeit unserer Staedte. Anstiftung zum Unfrieden, Frankfurt/M.
- Mooser, J.
1983 "Abschied von der "Proletaritaet"", in: W. Conze, u.a., Sozial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Stuttgart.
- Nedelmann, B.
1984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Changes in Processes of Intermediation", in: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6): 1029-1048.

- Nelles, W.
 1984 "Kollektive Identitaet und politisches Handeln in neuen Sozialen Bewegungen", in: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4): 425-440.
- Piore, M.; Ch. Sabel
 1985 Das Ende der Massenproduktion, Berlin.
- Rodenstein, M.
 1991 "Staedtebaukonzepte - Bilder fuer den baulich-raeumlichen Wandel der Stadt", in: Haeussermann, H. u.a., Stadt und Raum, Pfaffenweiler.
- Rodriguez-Lores, J.; G. Fehl (Eds.)
 1985 Staedtebaureform 1865-1900, Hamburg.
- Roth, R.
 1985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in der politischen Kultur der Bundesrepublik", in: Brand, K.W. (Ed.),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in Westeuropa und den USA. Ein internationaler Vergleich, Frankfurt/M.
- Schmoll, F.
 1990 "Schneller Wohnen", in: Borst, R. u.a. (Eds.), Das neue Gesicht der Staedte, Basel.
- Scott, A. J.
 1982 "The Meaning und Social Origins of Discourse on the Spatial Foundations of Society", in: Gould, P.; O. Gunnar, (Ed.), A Search for Common Grund, pp.141-156, London.
- Scott, A.J.; M. Storper
 1986 Production, Work, Territory, Winchester, Mass.
- Smith, M.P.; J.R. Feagin (Eds.)
 1984 The Capitalist City, London.
- Stohr, W. (Ed.)
 1986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Chichester.
- Thienel, I.
 1973 Staedtewachstum und Industrialisierungsprozess des 19.Jahrhunderts, Berlin.
- Wallerstein, I.
 1979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London.
- Walton J.
 1985 Capital und Labor in the Urbanized World, London.

